

江西阳明学的转向与明末制艺风潮之起

张艺曦

阳明学在明中期引动极大的风潮，翻看当时讲学的问答内容，前来听讲的人，很多是对心性的体认，以及这些体认与儒经上的记载是否吻合的茫然与焦虑。当时既多且盛的讲会，《传习录》与古本《大学》这些小书的广泛流传及阅读，以及心学家的画像的流行，都凸显出人们对阳明学的急切与热忱之情。^①

但盛极一时的阳明学，到了万历朝中晚期以后却有衰微之象。阳明学初盛时，常见许多人不惜远道前往问学或听讲，以寻求内心疑惑的解答。但万历朝中晚期以后，所见却是众人行礼如仪，而少再有为解惑而四方寻师访友的焦虑与强大动能。相反的，却有越来越多批评阳明学的声音。^②倘若以大儒与讲会为衡量标准，大儒后继无人，讲会在数量及规模上萎缩，这些衰微的症状，在江西来得极早。^③大约到了万历中期，江西阳明学重镇吉水、安福等地，已不复往昔大儒林立辈出的景况，而且讲会几乎

① 见张艺曦《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阳明交通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2章，《〈传习录〉与古本〈大学〉的流传及其影响》，第35—70页；第3章，《阳明画像的流传及其作用》，第71—124页。

② 如万历三十二年（1604）东林书院的成立便是常被提及的例子。

③ 过往对阳明学的讨论集中有两方面：一是大儒的学术思想内容，一是大儒及其师友间的往来论辩及聚会。这两个层次的阳明学，都是以大儒为主角中心，而旁及于一些学术论辩与活动。无可否认的，学术思想是否精彩及具说服力、吸引力，是一门学术的核心所在，也是极关键的部分，但若有关学术的流传、影响及其盛衰，就不能只是看大儒及其思想，而必须看大儒以外的其他思想文化活动。过往的研究已有不少人注意到讲会活动，以及从讲会指向所谓的阳明学士人群，讲会活动的参与者，广及于一般中下层士人、布衣处士，甚至庶民百姓，所以我们根据讲会活动的次数、规模与频率，应更好评价阳明学的盛衰。

全面衰微，在数量及规模上都大幅萎缩。此外，江西阳明学大儒也不易再号召小读书人共同从事社会事业。过去我考察江右阳明学大儒及小读书人共同合作的社会事业，从嘉靖、隆庆到万历朝，前后有明显差异，嘉靖朝取得成功的社会事业，万历朝以后却难以为继。^①

值得注意的是，阳明学在讲会、社会事业等活动力减弱的同时，却在制艺领域有更多的进展。明代科举考试是以《四书五经大全》等书为定本，这些书籍所采取的解释是偏向程朱学的，而阳明学在很多基本概念上跟程朱学立异，对准备科举考试并没有直接的帮助。也因此，阳明学流行之初，人们对阳明学的热忱跟科考功名的考虑并没有直接关系，人们甚至还会疑虑阳明学不利于科考。清初俞长城〔康熙二十四年（1685）〕进士评王守仁（1472—1529）应试所作的制艺是“谨守传注，极醇无疵”^②，显示即使连王守仁也必须遵守程朱的传注，不能在科考中发抒其学说，此亦可佐证初期阳明学不利于科考的判断。

此生态到嘉靖后期以后有变，徐阶（1503—1583）以首辅身份鼓励阳明学大儒主持的灵济宫讲会，于是应试者不再只是遵循程朱学之说，甚至不时有人援引阳明学说进入制艺写作中。我们从坊间流行的科举用书，也可观察到这股风气。如汤宾尹（1568—1628）这位在万历年间主盟制艺文坛的宗匠，他与出版业的关系极密切，所出版的书籍有不少是跟科考有关的，所以对当时的制艺文风的影响甚大。他所编的科举用书，竟然直接以良知解经，亦可见当时阳明学已明显渗入科举用书中，而且被进一步用到制艺写作上。^③这也凸显出，万历朝的阳明学已不仅仅是一门师友在野讲学的学术而已，而且进一步扩展及于科举用书，甚至影响制艺写作。所以

① 吉水、安福两地的社会事业，可分作明中期与晚明两个时期。明中期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的社会事业十分成功，但万历朝以后便不复以往，尽管第二或三代的阳明学大儒仍持续推动，但所得到的回响，以及从官到士到民的协力及合作，已越来越少，以至于在成效上大打折扣。请见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2006年版，第五、六章，第275—387页。

② 俞长城：《显王阳明稿》，《可仪堂一百二十名家制义》卷六《王阳明稿》，日本公文书馆藏文盛堂怀德堂全梓乾隆戊午年（1738）重镌本，第63页。

③ 请参见张艺曦《汤宾尹与晚明制艺八股文的流行及传说》，（台北）《汉学研究》2022年第1期。

讨论明末阳明学的发展，也必须注意科举用书及制艺写作这一块。

也因此，我们有必要从两条线看阳明学：一条线是大儒主持讲学及举行讲会活动，另一条线则是阳明学与制艺的结合。这两条路线，先是前者为主线，但越到明末，后者的重要性日增，而且反客为主，成为阳明学发展的主线。阳明学作为诠释儒经的学说，进入制艺写作中，进一步促成明末江西制艺风潮的兴起。

一 从鼎盛到中衰

（一）阳明学大儒主持下的讲会与社会事业

16 世纪是江右阳明学派发展极盛的时期，不仅百家争鸣，而且大儒辈出。黄宗羲（1610—1695）《明儒学案》江右学案所列人物的地域分布，分别在吉安、南昌、抚州三府，其中吉安府的吉水、安福两县则是重镇。两地分别有极具声望的大儒主持讲会，安福以邹守益（1491—1562）为首主持复古书院的复古会，最盛时前来聚讲者达到千人之多。加上乡里间也有小读书人举行乡会、族会或家会，让学术有更多机会接触到基层农工商人与平民百姓。^① 罗洪先（1504—1564）主持下的吉水阳明学，虽然讲会不盛，但仍可借由家族网络而下及于各阶层的人。

除了讲学以外，万物一体的理想则驱使阳明心学家致力于觉民行道，推动诸如乡约、丈量，甚至赋役改革等社会事业。乡约一般是在乡的层次举行，如邹守益便曾主持安福北乡的乡约达二十多年之久，就乡约这种短期性的措施来说，能够持续举行二十多年，是非常不容易的事，若非有邹守益及其族人主持，应该很难做到。除了乡约以外，阳明学大儒还结合地方上小读书人及家族举行田土丈量。田土丈量等事牵涉极广极杂，一方面须取得官方

^① 有关阳明讲会的研究，可参考吕妙芬《阳明学士人社群：历史、思想与实践》，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3 年版；陈时龙《明代中晚期讲学运动（1522—1626）》，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年版。阳明心学家的活动，请见吴震《明代知识界讲学活动系年》，学林出版社 2003 年版。关于阳明学大儒及小读书人的合作所展开的社会事业的研究，请见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

的授权，以及官方与百姓的信任。另一方面，由于牵涉田土面积及赋役，不能够仅仅书面作业而已，必须真的下乡丈量，所以需要大量的人力人手。过去我们较常见地方士绅造桥铺路，但对属于官方权责的田土丈量及赋役，则多仅向官方提出意见或方案，极少直接涉入。但两县的阳明学大儒却一力承担此事，动员地方上的小读书人，取得地方家族的合作，历经艰辛，克服获得既得利益的士绅的重重阻碍，终于完成田土丈量。完成丈量以后，邹守益、罗洪先等人更进一步针对安福、吉水两县的赋役税则的弊病，提请当道官员改革，这比丈量更敏感，牵涉更大，为此甚至提请到巡抚等级的官员裁夺。^①

从举行乡约，到实际的田土丈量，甚至赋役改革，这些都不是一人之力可以完成，而必须仰赖群体的力量。倘若仅仅是利益团体，这类牵涉实际利益的事务，很难取得他人的信任及合作。若是官方来做，又往往流于书面作业，而极少实际下乡丈量，更遑论赋役改革。两县阳明学大儒，借由阳明学学说的说服力，讲会的凝聚力，以及小读书人协力奔走、地方家族的合作，才有可能成功。就此来看，阳明学学说及讲会活动是这些事务能够成功的核心所在。

正因学说是核心所在，这些阳明学大儒的学术宗旨，也跟这些觉民行道的实践或多或少有关。阳明心学家常会有宗旨，以宗旨作为其学术关键主轴，^② 邹守益的宗旨是“戒慎恐惧”，这个宗旨固然有其学术本身的内在意义，但我们若是考虑到邹守益在安福推行的这些化乡事业，必须在官员、百姓，以及小读书人群体间协调，而且事事皆须小心谨慎，如临深渊，如履薄冰，便很能够跟他的宗旨连结在一起来看。^③ 相较之下，罗洪

① 本段所谈的田土丈量，请参考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第五、六章，第275—387页。

② 王汎森：《明末清初思想中之“宗旨”》，（台北）《大陆杂志》1997年第4期，第1—4页。

③ 安福丈量牵涉许多实质利益的分配，所以过程几经波折，阻挠及争议不断。先有士绅王纯卿（字）纠众上诉到知府与巡抚，主张丈量不便，以及负责丈量事务的心学群体中的生员有收贿之嫌，这些流言导致原本支持丈量的知县的退缩，而巡抚甚至直接反对丈量。邹守益身处此境，尽管所言所行皆本于良知，所持的是万物一体、痼疾在抱之心，但为求有所进展，在应对地方士绅的反弹、官方的犹豫质疑，更须戒慎恐惧。邹守益先是几次致函当道，取得官方的信任，随后在官员的主持，心学群体诸人的执行下，才终于完成丈量工作。邹守益感叹整个丈量工作是“三摇而后成”。此可佐证为何邹守益以戒慎恐惧为宗旨，以及将所持的宗旨落实在实际的化乡作为及实践上。见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第307—318页。

先虽然也必须谨慎小心，但因化乡的范围仅限于同水乡，而且是透过人际及家族关系网络进行，罗洪先等于是这整个关系网的中心所在。以一人一身而系此化乡事之利害及成败，便很好理解罗洪先为何要主张“归寂”，必须回归到内在最隐微而寂静之自我，以免有一言一行之不慎，便令事情有差池。

从阳明学所秉持的万物一体之说，到师友讲学，到一人之学说宗旨，以及联结众人所从事的化乡事业，从至广到至微而至实务，都跟阳明学密切相关。此全体作为之社会事业，可说是阳明学群体对其学说的具体实践。

（二）阳明学大儒后继无人与讲会萎缩的窘境

但进入万历中期，大约1600年以后，江右阳明学却有中衰的迹象。由于《明儒学案》所列的大多数是学术上有特色、有跨地域影响力的大儒，所以我们有必要进入地方层次看，方可具体了解中衰的情形。

江右阳明心学以安福、吉水两县为重镇，加上庐陵、泰和两县，几县的阳明学皆曾盛极一时。迄于万历朝，安福、吉水两地的阳明学大儒已传到第二或三代，如邹守益的事业便由孙辈邹德涵（1538—1581）、邹德溥（1583年会试第二）、邹德泳（1586年会试第九十八名）三人承续，以及王时槐（1522—1605）、刘元卿（1544—1609）等大儒，但邹德涵早卒，王时槐、刘元卿等人病歿。声望极高的邹德溥，曾任翰林院编修及经筵讲官，并三次担任会试考官，^①却在万历二十六年（1598）因掘金事而被劾罢革职，导致声名陨落。（后详）吉水则在罗洪先以后，有邹元标（1551—1624）继起，罗、邹二人并无学术传承或师弟关系，罗洪先的学术事业多仰赖他所居住的同水乡的家族网络，而邹元标则居住在县城，加上并非出身世族，虽拥有高名，并主持县城的仁文书院，但对吉水当地的影响力却已远不如罗洪先。罗大紘（1586年会试十四名）则入佛甚深。庐

^① 分别是己丑年（1589）《春秋》经考官，壬辰年（1592）与乙未年（1595）考官。见邹德溥《邹太史文集》卷二《己丑春秋同年藁序》《壬辰同年稿序》《壬辰春秋同门稿序》《乙未同年稿序》，傅斯年图书馆藏安成绍恩堂刊本清刊本，第21—23页。

陵无代表性人物，所以当地阳明学讲会有赖大儒王时槐往来庐陵、安福之间，王时槐之后便无继起者。泰和在嘉靖年间虽先后有欧阳德（1496—1554）、胡直（1517—？），但二人在朝时间久，居乡时日不长。万历朝郭子章（1543—1618）平贵州乱颇有军功，但理学毕竟非其所长，所以影响力不大。^①也因此，直到万历中期以后，吉安阳明学便剩下邹德泳与邹元标二人主持学术。

南昌、抚州两地也有由盛而衰的迹象。南昌在嘉靖朝有三魏兄弟主持学术，万历朝则有章潢（1527—1608）、邓以赞（1542—1599）、万廷言（1530—1610）等人，几人卒后，^②朱试继起，被认为是唯一能继承其师章潢学术者，^③同时也是邓以赞的弟子，曾负责删节邓以赞的语录。^④朱试在南昌当地受到不少人推崇，而且有一些故事流传，其中一则是文德翼（1634年进士）在天启六年（1626）随其父文士宏至南昌谒见朱试，当文士宏返回九江，朱试则以“吾道在九江”语之，文士宏回到九江后，建嚶鸣会馆聚徒讲学。这是模仿宋代程颢（1032—1085）与杨时（1053—1135）的故事，等于把朱试抬高到程颢的高度。^⑤但朱试的学术及声名已不足以与上一辈的大儒相提并论，更像是地方性学者，所以未被《明儒学案》所提及。除了个人讲学以外，万历朝由官方倡立的澹台祠讲会，曾吸引千百人与会，可谓一时盛事。（后详）

① 万历二十九年（1599）郭子章任贵州巡抚，平杨应龙之乱，万历三十五年（1607）告老还乡。当新城涂伯昌对心学有疑惑时，前往吉安问学于郭子章，并且在其家中待了两年，但其疑惑始终未能得到解答，以至于痛哭失声。见涂伯昌《涂子一杯水》卷三《乙稿序》，《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77页。

② 邓以赞卒于1599年，章潢卒于1608年，而万廷言卒于1610年。

③ 许应鑠等修，曾作舟等纂：同治《南昌府志》卷四三《人物》，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25页。李孟白赴任江西布政使职时，顾宪成还特别委请其探访朱试，见顾宪成《泾皋藏稿》卷五《与李方伯孟白》，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22页。顾宪成把朱试视为可以与章潢后相颉颃者，见顾宪成《论学书》，《明儒学案》卷五八《东林学案一》，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1396页。

④ 邓以赞有一句名言：“天不做，地不做，圣人也不做。”但文集中删去此语，顾宪成以为邓以赞是担心后学狂放而删，殊不知是朱试所为。见文德翼《雅似堂文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93册，第6页。朱试的传记请见文德翼，同前书《朱守约先生小传》，第1—2页。

⑤ 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卷一《圣学宗传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41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6—27页；陈鼎修，黄凤楼纂：同治《德化县志》卷三五《儒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4页。

抚州、建昌两府，即今日的抚州地区，两地交流颇为频繁，常串成一气。^① 万历朝此地区以罗汝芳（1515—1588）的影响力最大。^② 尽管罗汝芳早年在外，晚年方才回乡讲学，但却可引动一时的风潮，加上文集与语录的流传，不少人皆受其学术影响。临川、金溪两地便有李东明、黄宣二人传衍其学说。^③ 李东明，字勿斋，临川人，他的家族族人皆习于罗汝芳门下，从李中以下，李东明、李东成、李东宿，都是罗汝芳弟子，而且创建崇儒书院，作为临川当地的讲学中心，^④ 金溪黄宣是吴悌（1502—1568）的门人，也曾问学于罗汝芳门下，吴悌之后金溪当地阳明学便以黄宣为首。黄宣与李东明共同讲学，有《临汝讲学录》这本书作为记录。^⑤ 但无论李东明或黄宣皆未能拥有如上一代大儒的声名及引人注目的学术成就，所以我们看到新城涂伯昌（？—1650）甚至不惜远道前往吉安府问学。^⑥

整体而言，南昌、抚州、吉安三地的阳明学到了万历朝中期以后，只有邹德泳与邹元标两位大儒，仍持续讲学活动，并拥有较高的声名及影响力。

① 今日行政区划将两府合称抚州地区。

② 嘉靖朝以来，临川有陈明水，金溪有吴悌，新城有邓元锡，而南城有罗汝芳。陈、吴、邓等人皆潜心治学而声光不盛。

③ 李东明是万历年间临川当地阳明学的代表人物，见李来泰《莲龕集》卷一一《城南遗事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222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8页。童范儼修，陈庆龄纂：同治《临川县志》卷四二《儒林》，成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2—14页。万历朝另有陈文焯、李盘（1612年岁贡生）也有主持书院，大昌濂洛之学，见许应鏊修，谢煌纂：光绪《抚州府志》卷五六《人物·理学》，成文出版社1975年版，第16、18—20页。

④ 据载临川士人早先在寺庙讲学，而李东明的父执辈李中率先捐出家族的学舍，辟建崇儒书院，且捐田产以资费，不仅“郡之有讲会自中始”。以上请见许应鏊修，谢煌纂：光绪《抚州府志》卷五六《人物·理学》，第16、18—20页；童范儼修，陈庆龄纂：同治《临川县志》卷四〇《宦业》，第28页；李来泰：《莲龕集》卷一一《书院》，第15页。“崇儒书院，先叔高祖致吾公学舍也，后捐为郡中讲学之所。”1600年崇儒书院修缮时，吉水邹元标、罗大紘都曾为此书院作记。

⑤ 吴道南：《明贤原任袁州府教授升授国子监监丞黄重庵先生墓志铭》，《黄氏十修族谱》卷六，金溪浒湾镇黄坊黄福堂家藏，民国十年修，第8页。黄宣之孙黄榜开，也前往临川就学于李东明门下，见刘星耀《清故乡副进士黄墨鲜先生墓表》，《黄氏十修族谱》卷六，第13页。

⑥ 涂伯昌在万历四十年（1612）前往吉水，读书郭子章家。见涂伯昌《涂子一杯水》卷三《辛乙稿序》，第77页。相关研究见张艺曦《风潮递嬗下的地方小读书人：以涂伯昌为例》，收入氏著《歧路彷徨：明代小读书人的选择与困境》，第249—308页。

二 阳明学大儒的形象争议

阳明学的流传，主要透过讲会的举行、书籍的流传，以及大儒的圣人形象。前文谈到，万历朝以后，吉安阳明学大儒后继无人，同一时期，包括大儒的形象争议，以及讲会规模的缩减，也凸显出阳明学中衰的迹象。

阳明学讲究良知，谈论道德，目标就是成为圣人。我们从明中期以来许多的讲会记录来看，不少人受到致良知说的吸引前来听讲问学，致良知的目标是成圣，所以如何成为圣人，或者是更接近圣人，是当时的关键课题之一。人们自然也会拿着致良知与成圣的标准用来检视这些阳明学大儒。

我们若是翻检这段时期一些跟心学家有关的书籍或记录，便可发现不少有关心学家的言行事为的记录，这也显示出人们对心学家的言行事为的有意观察及注目。明人礼教规范相对宽松，往往不会诉求绝对的标准及规范，但心学家却常会被严加要求，诸如面对女色、紧急状况都不能动心，而其言行反应，甚至会被同时代人及后人所检验。如阳明学大儒胡直便曾特意记载乘舟时遇大风雨而色不变。^①

金钱则是最常被严加审查的一项，政治人物收受贿赂会被批评，而心学家若被说收受贿赂，所受到的伤害更大，毕竟一边谈良知，一边暗中收受贿赂，无论如何说不过去。即使是捏造的流言都可能造成致命伤害，而阳明心学家既常主持讲会，弟子门人众多，又常涉入地方事务，其实很难避免瓜田李下之嫌，也因此很容易引来不少争议。如罗汝芳任宁国府知府期间，便有收受金钱的流言，而为他辩解的人则说他所收的金钱都是用来救济穷乏。^②

^①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二二《江右王门学案七·宪使胡庐山先生直》，中华书局1985版，第522页。

^② 《明儒学案》记载：“耿天台行部至宁国，问耆老以前官之贤否。至先生，耆老曰：此当别论，其贤加于人数等。曰：吾闻其守时亦要金钱？曰：然！曰：如此恶得贤？曰：他何曾见得金钱是可爱的，但遇朋友亲戚所识穷乏，便随手散去。”这段记载很有趣，看似是御史耿定向询问地方知府之贤否，但耿定向与罗汝芳交好，加上这次问话广为人所传扬，可以想见这段话的重点在最后一句，亦即透过这次问答，为其澄清虽收受金钱但实未贪财。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三四《泰州学案三》，第805页。

在学风较严谨的吉安，对金钱的分际则严格得多。邹守益以下父子孙三代，可说是吉安阳明学最知名的家族，而邹守益作为江右阳明学的代表人物，领导安福的复古书院的讲会，以及全府的白鹭、青原讲会。孙辈的邹德涵、邹德溥，则在年轻时便已为众人所瞩目，并且被视为邹守益的学术传人。但邹德溥却因在所居锦衣卫千户霍文炳故居中发掘藏金，不仅被劾罢革职，而且几乎身败名裂。《万历野获编》记载此事：

文炳籍后，有空房为邹泗山洗马赁居，中有窖藏二万余金，不以闻官。旋奴隶辈争金事发，邹至褫职追赃，邹尽鬻其衣装，诸壬辰、乙未二科分考门生为贖金代偿，始克毕事。时洗马尊人（按：邹善）素严，闻之恨怒，泗山不敢归，至庚子（1600）始抵家。^①

这件事引起广泛的舆论讨论，许多人据此来贬损心学家，如好批评阳明学的伍袁萃（1580年进士），便刻意把此事说成心学家行检不端，他说：

王阳明极喜“座中有妓，心中无妓”之语时时称道之，故其门人多有蔑弃行检者。或诮之，则曰：“吾心原未尝动也。”……近有议邹泗山掘藏陨名者，潘尚玺雪松云：“此偶然应迹耳，泗山道大，原无利心，何足为累。”盖迹来士大夫酷好禅学，故议论多如此，而方正洁修之士，反以窄隘执泥病之。可怪也夫。^②

正因此事对心学家的形象伤害甚大，所以连邻县的邹元标也须为其辨白。邹元标的序中提到掘金事，惋惜邹德溥当为国宝，却须抱璞自老，不以为世所用。邹元标说：

余心期汝光为世舟楫，乃无端中人言归。盖汝光侍直久，众所尊信，中者与忌者交斗捷，而汝光一意内修，不习世间行，故卒罹媒孽

①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六《霍文炳并功》，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172页。

② 伍袁萃：《林居漫录》卷五《畸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子部第242册，第559页。

耳。吾党与汝光相习者，邓少宰汝益（按：邓以赞）、杨少宰贞复（按：杨起元）、刘徵君调甫（按：刘元卿）、罗给谏公廓（按：罗大紘），咸颦蹙而语邹子曰：汝光吾党神龙，一队田间，骧首何日？邹子曰：夫果神龙也，可潜可见，……龙不需世，世不能不需龙。后之读兹集者，必恍然而慨曰：汝光盖代史才，当为国宝，而忍令抱璞自老，不能为世蒿目也。^①

有可能是这个事件，使得邹德溥在江西及其故乡安福的影响力迅速减弱。目前留下来的邹德溥的文集，应是在他在万历二十八年（1600）归乡不久后刊刻，此后便很少见到他的行迹或活动。万历三十一年—三十二年（1603—1604）间复古书院的整修工作，皆由邹德泳一人独力完成，而前后的大会，也都是邹德泳主持，而未见邹德溥的名字。（后详）

吉水邹元标是明末吉安阳明学的代表人物，也是整个江右阳明学的殿军，连他也受流言及争议所苦。天启年间，邹元标与冯从吾（1556—1627）联袂讲学于北京首善书院，这是政治上的大事，江西人士颇引此为豪。如文德翼，他是章潢的再传弟子，朱试的门人，他说：

余少时犹及守约朱夫子（按：朱试）门，得闻绪论，一时邹忠介（按：邹元标）、李忠文（按：李邦华，邹元标的门人）讲学首善书院，与乡里澹台、濂溪、鹅湖、鹿洞，互相倡明，人材尔时多瑰奇俊伟。^②

首善书院讲会为期甚短，但被文德翼置于最首要的位置。然而，江南姚希孟（1579—1636）却刻意揭露邹元标在首善书院开讲前，清晨独自前来敲门，表达对讲会的犹疑之意。由于是清晨敲门及私下简短谈话，所以若真有一事，也仅姚、邹二人知晓而已，但姚希孟却选择在邹元标死后谈

^① 邹元标：《宫洗泗山先生全集序》，《邹泗山先生文集》卷首，傅斯年图书馆藏清安福绍恩堂刊本，第3—5页。

^② 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卷三《史惺堂先生文集序》，第35页。

论此事。姚希孟，字孟长，号观闻，吴县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他说：

忆辛酉（1621，天启元年）冬，中州某公一日集十余客，先生与希孟俱预焉，颇商及学问事，酒三行，邹先生振音丁（按：应作“歌”）人心仲尼之诗以侑之，余固疑其讲社也。决旬而冯先生折简相招，集城西道院，至者几三十人，多一时名卿，先生拈若合符节语，穷其合一何在，间有一二逆难首（按：应作“送难者”），迄无了义。余归，从枕上寻绎，复念世人侧目群贤久矣，鞶鞶（穀）下复阁讲坛，谣诼之囿也。甫明，而邹先生叩门来，谓此会毋往，余跃然曰：余因欲止两先生。邹先生曰：冯子以学为行其道者也，毁誉祸福，老夫愿之。又数日，而先生来，余讽曰：国家多事，士大夫宜讲求者非一端，讲学宜少需乎？先生曰：正以国家多事，士大夫不知死，抱头鼠窜，踵相接，宜唤起亲上死长之心，讲学何可置也。余墨（默）然不敢对。壬戌八月，余乞假还，先生召余暨魏给谏大中盘桓，抵暮而别，别后人言蜂起，先生归秦。又二年，珰祸作，余从锋林剑树中留此身，以事圣明，然骨脆力蹇，迄未窥学问之藩，而先生不作矣。^①

此文是为冯从吾所作的神道碑，成文的年代不详，但既是神道碑，且收入冯从吾的文集附录，因此很可能作于冯从吾死后不久。冯从吾，字仲好，号少墟，陕西长安人，是明末程朱学的代表人物。邹、冯二人学术路数不同，但因二人分任左都御史与左副都御史，二人又皆以学术形象著称，都察院僚属为建首善书院，于是以二人为首，开启天启年间在北京的首善书院讲学。姚希孟此文则揭露书院未建时，冯从吾先已在城西道院讲学，姚希孟对讲学有所犹疑，而某日清晨，邹元标前来敲门，劝阻姚希孟不必与会，但邹元标本人则愿意继续陪伴及支持冯从吾。

^① 姚希孟：《神道碑》，《冯少墟续集》第14册《附录》，新文丰出版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21—22页。此文也收入姚希孟的文集中，见姚希孟《棘门集》卷一《太子太保工部尚书谥恭定冯先生神道碑》，第5—6页。

姚希孟的这段文字，勾勒冯、邹二人的不同形象：冯是一往直前，甚至为道殉身亦在所不惜；邹元标是思虑周详，却难免瞻前顾后。这跟他早年以直谏张居正（1525—1582）夺情而闻名的形象大不同。在晚明党争激烈化，江南东林诸人讲究是非判然分明，不能有灰色模糊地带的风气下，而邹元标一方面伴随冯从吾讲学，一方面却清晨敲门，嘱付姚希孟不必参加讲会，若从恶意解读，也可认定邹元标只是因其左都御史身份，不得不随同讲学，而他嘱付姚希孟的话才是真实内心的想法。以姚希孟的博学高识，对此类解读的可能性岂有不知之理，但他却在神道碑中揭露这段只有天知地知邹知姚知的事，而天、地、邹皆不会也不能与其辩驳。更进一步看，冯从吾曾作《善利图说》，姚希孟自然熟知。《善利图说》主张人之为舜，之为盗跖，只在最初一念之别，人走上“舜之路”或“跖之路”，皆只在最初一念。从晚明善恶分别的标准看，邹元标的最初一念是有疑义的。

也因此，姚希孟此文是很可争议的。邹元标与冯从吾分别卒于天启四年（1624）与七年（1627），此文既作于冯从吾卒后，但也是邹元标尸骨未寒之时，姚却在此文中揭露一段对邹元标不尽有利的故事，以抬高冯从吾的地位。邹元标尸骨未寒，又不能起于地下为己辩驳，则此段敲门事既不必写，也不应写。不写此事，神道碑仍是神道碑，不缺此一笔。铺陈此事，则陷邹元标于不利处境，且让邹元标无从辩驳。何况姚希孟是何等人物，旁人若听闻此事，或可能以为只是乡野传闻，但见姚希孟署名，则还有谁会怀疑此事不真？此事既真，则坐实了邹元标的迟疑，以及在气节上、学问上都低了冯从吾一截。姚希孟的这段文字，也正呼应了顾允成及黄宗羲对邹元标的评语——“晚年论学喜通融而轻节义”^①。甚至还可以与《三朝野纪》所述当时人的说法呼应，同时代人訾议邹元标是“前半峭直，

^① 黄宗羲撰，沈芝盈点校：《明儒学案》卷六〇《东林学案三》，第1469页。黄宗羲的这段话是放在谈顾允成的段落。紧接在这段话后是：“先生（按：顾允成）规之曰：夫假节义乃血气也，真节义即义理也。血气之怒不可有，义理之怒不可无。……近世乡愿道学，往往借此等议论以销铄吾人之真元，而遂共同流合污之志。其言最高，其害最远。”黄宗羲所引的这段话出自顾允成的书信，顾允成卒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所以此处是谈此年以前的事。顾允成是个热衷政治，但好恶分明又好攻击人的人，此信表面尊敬邹元标，但其实暗指邹元标恐流入道学乡愿一途，不能与东林同流，共同卷入政争而言。

后半宽和”的两截人，甚至质疑其“伪道学”。^①

不仅如此，邹元标居乡期间也有许多流言，沈长卿（1612年中举）的《沈氏日旦》记载一事，事关邹元标的生前名节，沈氏说：

豫章邹南皋先生，名元标，海内望如泰山北斗，为道学主盟。歿未几年，巨寇刼其赀去，以二千金计。此亦其乡人之言也。日久论定，存此说以为案据。^②

由于邹元标出身寒微，加上居乡近三十年，家中不可能有二千金这么一大笔钱，所以这段流言暗指邹元标收贿。尽管是引自乡人传说，但人言可畏，而沈长卿记录此事，显然倾向认为此事不是空穴来风。倒是明末艾南英（1583—1646）的一段话对邹元标是比较有利的，他指称，由于邹元标的门人弟子常涉入地方事务中，于是被人怀疑收受礼金或贿赂，而待其死后，身家清寒，流言方才不攻自破。艾南英说：

盖不肖之乡有邹南皋先生者，以直谏请节闻天下，居乡受讼牒，必侦其不平者，诤之有司。然而门生食客山人星相族子狡奴，时从中上下其手，先生势不能不寄耳目焉，有司面从，而实之，应且憎矣，故南皋先生之谤不少。及今捐馆，以官保总宪而家业不满千金，然后南皋先生之心迹明。不肖之乡，先时又有罗近溪先生者，笃交游，明理学，门生有一长，喜见于色；其讲学子弟有缓急。千里来叩，必以其身任之，或诤之抚按，或诤之他省抚按，然终不免以热肠受谤，又终不免以广交受欺。至先生捐馆，家贫不能具棺，而后近溪先生之心迹明。夫两先生者可谓廉于持己勇于任事矣，而不能至于圣贤者，知人之明、事先之哲不如圣贤也。^③

① 李逊之：《三朝野纪》卷一《泰昌朝纪事》，巴蜀书社1993年版，第13页。

② 沈长卿：《沈氏日旦》卷一二《闽中苏紫溪先生》，《四库禁毁书丛刊》，子部第12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2页。

③ 艾南英：《天佣子集》卷五《初答临川张侯书》，第27—28页。

这类流言向来是信者恒信，不信者恒不信，但毕竟人言可畏。当时还有一些笑话调侃这些心学家，陈际泰便曾引用（或捏造）一则故事，说：

邹南皋，理学名家，士之争尊而附之者也。有眇君子者，重趸百舍，而思媚之，至则请曰：“先生化及飞鸟矣！有鸟鸣于阡之近渡者，或以为割麦过荒，非也；或以为推车过河，亦非也；直从先生之学，曰切磋琢磨耳。”闻者哄然。^①

邹元标是明末江右阳明学派的指标人物，若连他也受人调侃传笑，则其他人的境遇可想而知，更何况其中也未必都是虚而无实。同样出自艾南英的观察，他说：

敝乡理学之盛，无过吉安，嘉隆以前，大概质行质言以身践之，近虽自爱者多，而亦不无仰愧前哲者，田土之讼、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风，日有见闻。不肖视其人，皆正襟危坐，以持论相高者也，岂非虚谈盛而实学衰？苟以耳自聪目自明便安自然之为可贵，而不复知有修省持循闲居屋漏之指视为可畏哉！^②

不确定艾南英是否实有所指，细绎其文意，有田土之讼、子女之争、告讦把持之风者，似乎不止一人。这段话出自艾南英给蔡懋德（1586—1644）的信件，蔡懋德任江西提学副使，积极提倡心学，所以艾南英在信

① 陈际泰：《已吾集》卷四《程子易赘序》，《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9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版，第2页。陈际泰不喜讲学事，可从一事见出：当崇祯二年（1629），蔡懋德任提学副使，大力倡导阳明学，并与陈际泰、艾南英等人谈学，但二人却不领情。如艾南英记述：“（陈际泰）生平不喜讲学，不谈禅，蔡云怡（按：蔡懋德）以二美妙天下，欲与大士（按：陈际泰）说微，往返数千言，竟不能屈大士而去。”二美即心学与禅学，往返书信数千言，即谈心学与禅学。见艾南英《明赐进士出身征仕郎行人司行人陈公方城先生墓志铭》，《已吾集·附录》，第3页。

② 艾南英：《天佣子集》卷六《再与陈怡云公祖书》，艺文印书馆1980年版，第2页。

中表达他对心学家言行不一的失望。^① 这都凸显出明末江西士人对阳明心学家已颇失望，甚至心生不满及贬抑之意。

三 阳明学讲会的中衰

（一）阳明学重镇的没落

尽管明末阳明学群体仍有活动，但从讲会活动的中衰，可想见万历中期以后阳明学群体的处境。阳明学讲会并不是从盛况急遽滑落，而是听众日少，讲会也越来越少举行，即使有大儒或地方士绅力图振兴，但往往只有短暂的效果。由于安福、吉水是江右阳明学的重镇，最具代表性，所以下仍简述两县阳明学由盛转衰的状况，同时也讨论作为江西政治经济及文化中枢的南昌，当地澹台祠会的兴起及发展。

安福、吉水两县作为阳明学重镇，安福的复古书院讲会、吉水的雪浪阁讲会，以及全府在青原山的年度讲会，往往吸引数百或上千以上的人前来与会，包括中下层士人、布衣、处士或庶民，甚至有不少人是远道从他县或他府而来。当时各地不断兴建各个书院，或者召集各类讲会，讲会举行的频率很高，大会是一年一次或数次，小会则可能一个月就有两到三次之多。安福的讲学活动极盛，除了复古书院以外，还有复真、识仁、道东书院等，而各乡还有小读书人举行乡会或家会。讲会活动较弱的吉水，也有罗洪先的石莲洞讲会，以及玄潭雪浪阁的年度讲会，仍可吸引吉水当地及他地人士远道前来听讲。

但万历朝以后，大儒或卒或病或因事而声名陨落，使得万历中期以后的讲会活动趋于中衰。石莲洞僻远，所以在罗洪先去世后便即荒废，接续而起的邹元标一方面重振玄潭讲会，另一方面则把重心放在县城的仁文书院讲学，该书院虽名列全国四大书院之一，但其实已无复当年石莲洞讲会

^① 艾南英及其论敌张自烈，二人对制艺的见解有别，在选本上也有纷争，不过，二人在私怨上纠葛，但对心学则都采取批评的立场。张自烈有《答问录》，全卷都在攻击陈献章、王守仁以下的心学大儒，而邹元标更屡屡被张自烈点名，指斥其见解是“暗且陋”，其讲说是“最害道”。见张自烈《芭山文集》卷三《答问录》，《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166册，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5、14页。

的盛况，前来问学的也多半是当地人士。

安福复古书院则历经几次的兴衰，先是邹守益卒后便有荒废之象，待邹德涵、邹德溥兄弟二人加以整顿，士风丕变，^① 复古书院亦见复兴。但待二人先后考取进士，离乡任官，复古书院很可能又渐荒废，此后有邹德泳重振。邹德泳是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官至侍郎，万历二十年（1592）因国本之争而被革职。^② 邹德泳回乡便致力于恢复昔日讲学之风，目前所见最早的记载是万历三十年（1602）他在复古书院举行全县大会，以大会告于四乡，而四乡人士蜂集，被视为“数十年未有盛会”。^③ 万历三十一年—三十二年（1603—1604）间邹德泳在地方官员的协助下整修复古书院，则被视为“中兴复古”^④。但相较于嘉靖年间各地士人不远千里而来讲学的情形，重振后的复古书院讲会应只有当地人参与而已，所以除了邹德泳的文集提及此会以外，我们便很少从其他资料看到相关活动。

（二）乍起的微光：南昌澹台祠讲会

在阳明学中衰的时刻，万历晚期南昌澹台祠讲会，一度吸引许多人的注意及参与，但这或许只是乍起的微光。澹台祠又名友教书院，与白鹿洞、白鹭、豫章等并列江西四大书院，万历十五年（1587）南昌知府范徕与知县何选重修澹台祠，建为书院，匾曰友教堂，所以澹台祠书院又名友教书院。^⑤ 万历四十一年（1613），江西巡抚王佐（1550—1622）^⑥ 以东湖湖滨地狭，所以迁书院址到府学南棉花市街，参与此役的士绅据载共26名，分别是：熊惟学（1538—？）、徐来凤、徐作（1540—1620）、高则益、舒琛、邹元忠、王尚宾、黎道照（1589年进士）、万民命、涂乔迁（1550—1632）、关

① 刘元卿：《刘聘君全集》卷八《河南宪金聚所邹君行状》，《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庄严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7年版，第4页。

② 邹德泳自述：“忆昔壬辰蒙谴以来，阖门惶恐，迨三十寒暑，……光皇帝御极，乃首揭国本获罪一条，亟赐录用，而臣泳名在第六。”邹德泳：《拜恩录》，《邹德泳杂著》，美国国会图书馆藏明刻本，第1页。

③ 邹德泳：《复古纪事》，《邹德泳杂著》，第20页。

④ 邓仕俊：《复古纪事跋》，《邹德泳杂著》，第51页。

⑤ 这方面的研究见李劲松《江西南昌友教书院记事》，《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2期。

⑥ 王佐，字翼卿，号太蒙，浙江宁波府鄞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

香、李右谏（按：应作李石谏）、邓士龙（1595 进士）、方尧庚、刘灵、熊宇奇（1558—？）、魏时应（1595 年进士）、饶伸、舒曰敬（1558—1636）、周著（1560—？）、邹复宣（1613 年进士）、黎民表（1515—1581）、饶景炜、刘定国、万建崑、欧阳璨，共二十六人。^① 其中既有属于文学阵营，尤其是复古派人士，也有理学阵营者。^② 如徐作是佳山社与龙光社这两个著名诗社的成员，邹元忠与阳明学者邹元标同宗，而邹元标为澹台祠作序。^③ 显示初期应无学派或阵营的倾向，而是从倡导地方文教的角度来兴复书院。

迨及万历四十三年（1615）澹台祠讲会，则已倾向理学，与会者一度达百千人之众，据载：

王大蒙（按：王佐）作巡抚，治行宏博精到，已为绝伦，近又留心理学，创澹台祠开讲，俨然阳明先生流风。^④

当时主讲者多是阳明学者，分别有与邹元标同宗的邹元忠、邓以赞之兄邓以诰^⑤、章潢的弟子万尚烈。^⑥

① 承需修，杜有裳、杨兆崧纂：同治《新建县志》卷二二《裡祀》，江苏古籍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1 页。

② 但其中也有一些士绅，看不出有学术倾向，如邓士龙，曾作《国朝典故》100 卷。

③ 邹元标：《愿学集》卷五《澹台祠碑》，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1294 册，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3 年版，第 55—58 页。另外，万建崑是万虞愷之孙，万廷言之子，跟阳明学也颇有渊源。

④ 罗大紘：《紫原文集》卷六《東广东宪使张三阳》，《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40 册，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37 页。

⑤ 邓以赞卒于万历二十七年（1599），邓以诰直到天启末年仍在世。见文德翼《日录》，《雅似堂文集》，第 7 页。

⑥ 承需修，杜有裳、杨兆崧纂：同治《新建县志》卷四七《儒林》，第 13—14 页。“时巡抚王佐讲学澹台祠，又会讲龙光寺，敦请元忠与邓以诰、万尚烈、刘一焜、关香主其事，率多所成就。”何庆朝纂修：同治《武宁县志》卷二三《人物》，成文出版社 1989 年版，第 28 页。“万尚烈……致仕归，讲学澹台祠。……少师事章斗津先生，笃于性命之学。”邓以诰也著有《澹台祠讲章》，见陈弘绪《敦宿堂留书》卷一《衡州府知府邓公传》，《陈士业先生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补编》，第 54 册，齐鲁书社 2001 年版，第 14 页。万时华之父万民命（字允定）应也在此年里居，倡学澹台祠。万时华：《溉园初集》卷一《先府君行略》，《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144 册，北京出版社 2000 年版，第 13—14 页。舒芬之子梦滩先生也率其族人参与此会，因此有万时华为舒芬之孙舒忠说（字鲁直，崇祯三年举人）而作序，见万时华《溉园初集》卷一《舒鲁直制义序》，第 4—5 页。涂杰之子涂绍燿（字伯聚），万历四十三年（1615）举人，万历四十七年（1619）进士，地方志载他“末年讲学澹台祠”，见江璧等修，胡景辰等纂：同治《进贤县志》卷一八《人物》，第 9 页。

天启年间澹台祠曾因魏忠贤（？—1568）禁毁天下书院而受损，但很快便重建，^①并有朱试与万尚烈来此讲学，被视为“理学复振”，^②加上前来江西任官的蔡懋德与吴麟瑞（？—1644）积极倡学，一时颇振兴讲学之风。蔡懋德是昆山人，他到任时便以王守仁“拔本塞源论”示诸生，并与邹德泳书信往返论学。^③所以前引艾南英才会向蔡懋德表达对阳明学诸人的失望之情。吴麟瑞是浙江海盐人，与理学殿军刘宗周熟识，在江西担任湖东巡道，他初下车便拜谒祭祀罗汝芳的罗明德祠，并与诸生讨论学术。^④吴麟瑞较诸王佐与蔡懋德更专注于心学，而且著有《大学通（考）》一书，受到新城士人涂伯昌的高度推崇，^⑤认为“二千年纷纭之议复定于一尊”^⑥。

吉水、安福两地的景况显示万历年间并非无人试图重振讲会，加上邹元标、邹德泳等大儒主持，但最终仍面临困境。即连几个大型讲会也难以回复昔日盛况：青原讲会的风气已变质，^⑦白鹭洲书院的讲学活动在万历二十年（1592）以后明显中衰。^⑧至于澹台祠讲会就像日暮时的一盏微光，既有地方官员及士绅倾力扶持，加上朱试与万尚烈等人主持（尽管二人不具跨地域的声名，也没有大儒讲学的魅力），但令人惊讶的是，当三年一次的乡试期间，各地士人齐集南昌时应会有人前来讲会听讲，但却极少人提及此讲会，若非刻意勾稽史料，恐怕无人会注意明末朱、万二人的讲

① 熊明遇：《文直行书诗文》卷二《南昌府复澹台祠》，黄山书社2008年版，第6—8页。

② 朱试讲学事，见彭孙贻《茗斋集》卷二三《太仆行略》，《清代诗文集汇编》第52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3页。崇祯二年（1629）蔡懋德任江西提学副使，及崇祯五年（1632）解学龙任江西巡抚期间，二人敦请万尚烈主持讲学，见许应鑠等修，曾作舟等纂：同治《南昌府志》卷四三《儒林》，第22—23页。关于蔡懋德，因职官表未详其到任年，而从其小传，仅知崇祯初年来任。但据邹德泳的记载，崇祯二年（1630）蔡懋德前往永丰时，盼与邹德泳一会，可知此年他已任提学副使。见邹德泳《陈云怡公祖往回应学志》，《邹德泳杂著》，第1页。

③ 邹德泳：《陈云怡公祖往回应学志》，《邹德泳杂著》，第1—22页。

④ 曾国藩、刘坤一等修，刘绎、赵之谦等纂：光绪《江西通志》卷一二七《宦绩录二》，《续修四库全书》，史部第659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57页。

⑤ 见涂伯昌《涂子一杯水》卷二《古本大学通序》《古本大学辨序》《大学格物辨序》，第21—23、24—25、26—27页。

⑥ 涂伯昌：《涂子一杯水》卷二《古本大学通序》，第22页。

⑦ 万历初年邹德溥与其兄邹德涵曾共同振作青原讲会，这部分的研究请见张艺曦《社群、家族与王学的乡里实践——以明中晚期江西吉水、安福两县为例》，第四章第六节，第244—255页。

⑧ 请见张艺曦《明中期地方官员与王学学者的紧张——以白鹭洲书院兴废为例》，（台北）《大陆杂志》2002年第6期，第30—54页。

学，此亦可反证明末江西阳明学讲会之衰。

综言之，江右阳明学虽在明中期盛极一时，但进入17世纪以后，一方面讲学规模萎缩，讲会数量锐减；另一方面大儒阙如，若据《明儒学案》所列，江右阳明学在邹元标以后便无大家，^①而邹元标的活跃时间其实是在万历前期，但其在地活动及影响力已不能与邹守益、罗洪先等人相比拟，迨及天启朝（1621—1627）邹元标一度进入中央朝廷任官，主持首善书院讲学，但很快便因阉党的谤议而去职，在天启四年（1624）去世。邹元标去世以后，当地更没有跨地域声望的心学大儒，以至于清初施闰章（1618—1683）在康熙二年（1663）前来吉安讲学时明白指出：“西江讲学之会，吉州最盛，中辍者四十年矣。”^②所谓的中辍四十年，往前推算，正是从天启四年（1624）邹元标去世当年算起，亦可见从邹元标以后，已无大儒可以主持讲学，同时也已没有足以称道的讲会活动。

四 江西阳明学与制艺写作

前文谈到明末阳明学进入科举用书的趋势，也因此，尽管讲会中衰，但不等于阳明学全面衰微，相反的，阳明学的影响力却因此而更扩及于科举用书及制艺写作。如刘日升便指出“学道之有关于文章家非浅鲜”的说法，正面陈述制艺作者必须有心学的体悟，他说：

夫学道之有关于文章家非浅鲜也。不学则恣于才情而荡，不善学亦局于封识而锢。藉非六通四辟，闻所不闻，谕所独谕，上之无羽翼之功，下之无匡扶之效，即殫平生之力，极词人之致，其究率归于杨子所谓雕虫小技，壮夫不为者而已。^③

① 《明儒学案》虽以宋仪望、万廷言等人为殿军，但这是依师承及生年来作排列，实际上几人的卒年早于邹元标、邹德泳二人。

② 施闰章：《施愚山先生学余诗集》卷一九《鹭洲讲会歌》，《清代诗文集汇编》，第67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页。

③ 刘日升：《慎修堂集》卷七《邹尔瞻先生太平山房续集序》，台北“国家”图书馆藏明泰昌元年原刊本，第3页。

此处的“文章”指制艺而言。^①刘日升是吉安府庐陵县人，万历八年（1580）进士，他受当地阳明学流风的影响，而将阳明学与制艺写作连结在一起。

增补汤宾尹《四书脉》的徐奋鹏也将理学与举业连结在一起。徐奋鹏，别号笔峒先生，江西临川人，他在乡里所在的笔架山上设馆教授举业，日常必须面对一群习举业以应试的学生，但他倾心阳明学，所以希望让这些学生在举业之外也习理学。为此他教导学生分辨理学与举业的差异所在。例如知与行的关系，知行合一是圣贤之学，但举业则会把知与行分先后，而远离了圣贤的本意。^②例如格物致知之说，便举王心斋的淮南格物说，表示——“博士家多有从是说者”^③。也因此，在友人为徐奋鹏所作序中，便指出徐奋鹏的关键见解，是“以理学为举业”，必须让所作的举业文字符合圣贤之意之语。该序文说：

举业文字果理学外物，不必讲乎？曰：英人哲士，以理学为举业，即自己文字，即圣人贤人经语。卑者记诵套括之章，舔前人余唾为己口中津，殊陈腐可厌。嗟夫，此真学究也，理学之所以日晦，所自来矣。文字习而举业盛，举业盛而理学微，学者而奈何辨之不蚤辨也！^④

徐奋鹏曾另著《理学明辨》，正是有意让人以理学来明辨，以及以理学为举业。以理学为举业，正是明末许多小读书人的共同趋向。对学习举业的小读书人来说，阳明学可让人从不同眼光解读儒经，并将从心学所得到的启发及见解用于制艺写作上。

① 前引文中刘日升未具体指出文章是什么，而在另一篇序文，刘日升则说：“先是公守诸生，方肆力博士家言，即雅向圣学，曰：文章小技，士不闻道，出处皆冥行耳。”既是“博士家言”，可知这段话的“文章”专指制艺而言。心学作为根本，发而为制艺，才不至于失去方向。见刘日升《慎修堂集》卷二〇《中宪大夫督察院右佥都御史巡抚四川岳难谭公墓志铭》，第2页。

② “圣贤之学，知行合一，若分知行、分先后之说，此经生讲制举义之学，非所以论圣贤之学也。”见徐奋鹏《理学明辨》，《徐笔峒先生十二部文集》，中国国家图书馆藏，第19页。

③ 徐奋鹏：《理学明辨》，第3页。

④ 戴振光：《理学明辨录序》，《理学明辨》卷首，第1—2页。

涂伯昌也是一例。涂伯昌是江西新城人，该县在嘉靖年间有邓元锡（1529—1593）这位大儒，邻县南城则是罗汝芳的故乡。涂伯昌求学时期，罗、邓等人皆已去世，流风余韵亦已罕闻，于是涂伯昌及其姪涂世名自行寻找一些心学大儒的书籍来读，其中便有罗汝芳与涂宗濬二人的著作。涂宗濬（1555—1621）是李材（1529—1607）的弟子，在《明儒学案》列于《止修学案》中。有趣的是，他们读这些书其实是为了助其制艺写作。涂伯昌说：

仲嘉（按：涂世名）为予言别后读家恭襄公（按：涂宗濬）《隆沙证学记》，忽尔朝彻，数年所读罗明德书，忽于此印合，发为文章，遂洞洞不竭若是。^①

“罗明德书”即罗汝芳的著作，涂伯昌与涂世名二人分别读其著作有悟，于是写作制艺便可洞洞不竭。

涂伯昌虽在新城，但曾为习阳明学而远赴吉安，并待在当地两年之久。而他在后来写给邹元标的信上，自述有志于圣人之学，可惜未能亲承邹元标指导，于是附上己作以求删正。有意思的是，他所附的作品竟是经义十篇，外加一些古文辞与诗歌。经义即制艺。涂伯昌向邹元标请教的是阳明学，但他所呈上的竟是制艺，且说：“凡所为心不能言，言不能尽者，先生自能得之意中，观之意外。”^②

涂伯昌在另一篇序文还提到，他因制艺而识吉水土人谢白者（字），而涂伯昌特别提到该生祖父是邹元标的入室弟子，有颜子之目。谢白者虽专意于制艺，但在涂伯昌看来，其实与其理学的家学并不相违，因为阳明学可被用于制艺写作。涂伯昌说：

若夫圣贤之心，六经之旨，仁义礼乐之精微，汉唐宋诸大儒之疏

① 涂伯昌：《涂子一杯水》卷三《侄仲嘉文序》，第65页。

② 涂伯昌：《涂子一杯水》卷四《寄邹南皋先生》，第6—7页。

记，学者于其中所得之浅深，咸于经义徵之。^①

于是我们便不难理解心学家担任地方官员时，为何常会采取书院讲学的方式以倡导文教，且期待此有助于府县学生的举业。如徐即登就是很好的例子。徐即登（1545—1626），字献和，号匡岳，江西南昌府丰城县人，万历十一年（1583）进士，他师从李材，《明儒学案》中列入《止修学案》。他利用官职在书院倡导心学，但同时也讲制艺，如他在写给吉安阳明学群体的领袖人物之一郭子章的信上便谈到此事，说：

敢祈老先生首倡，诸老时临督教。初二、初十学会，专望亲临，十六、念六文会，时赐批示。^②

徐即登文集中保留许多在福建的书院讲学的语录，如《示书院诸生》一文，便是他与书院诸生的问答，问答的形式及所谈的内容，跟《传习录》或一些大儒的语录几无二致。^③以上正显示书院并不一定只有讲学而已，有时还会有制艺写作的课程及讨论。阳明学与制艺写作被并列为课程之一。

徐即登任福建提学副使期间，当时许孚远（1535—1604）任福建巡抚，而李材充军福建漳州镇海卫。^④徐即登与李材、许孚远三人在福建共同倡学，李、许同辈，而徐即登则居晚辈。三人都是在《明儒学案》列名的理学家，但许孚远所出示请徐即登作序的，竟是他的制艺作品，徐即登在序文中说：

学习不贵悟，匪悟弗入。顾论学于心学未明之时，透悟难。论学

① 涂伯昌：《涂子一杯水》卷三《赠谢白者序》，第10—11页。

② 徐即登：《来益堂稿》卷七《与郭青螺丈》，明万历刻本，第63页。在另一处也提及书院每月有一次讲学，一次课文，只是日期不同。共学书院是初二、十六，而崇正书院是初十、二十六。见徐即登《来益堂稿》，卷八《告示二》，第18页。两座书院都在福建。

③ 徐即登：《来益堂稿》卷二《示书院诸生》，第40—51页。

④ 刘勇：《晚明理学“止修”学派之宗旨与师承》，《思想史》5，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2020年版，第39—94页。

于心学既明之日，透悟易。……明学自良知倡彻之后，人知反求诸心，所难者，非悟也，于是二三名儒欲力砥其流。若今中丞许敬菴先生，盖其人者。^①

徐即登先是叹服许孚远之修持，及其学问见诸行事之实，然后评许孚远的制艺，说：

先生手时义一编示予，则昔之所程关士者，言言皆发明大旨，读之洞然如见圣贤之心，而灿然若指点眼前事，则又伏而叹曰：文一艺耳，发自先生之妙悟真修，斯诚有道之言哉，进乎艺矣！……因请先生所以程关士者，为闽士程，士其因文以见先生之学乎，则修与悟合，而邹鲁之风尚可还也。^②

令人惊讶的是，徐即登竟把制艺看作跟《传习录》等书一样，承载许孚远的妙悟真修，人们可藉此而见学。

若是聚焦在阳明学重镇的吉安来看，李日宣是跟徐即登很相似的例子。李日宣属于谷村李氏，该族是吉水同水乡六十一都的大族，与罗洪先同都，所以罗洪先在当地主持学术时，该族族人便有不少是其门人弟子。此后邹元标主持县城的仁文书院讲会，门人李邦华（1574—1644）、李日宣、李陈玉（1598—1660）、李元鼎（1595—1670），也都是该族族人。^③李日宣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进士，他在任官期间，便积极倡导阳明学，召集诸生聚讲，并留下一些对话记录。我们通读这些记录，可知与会诸生中有不少人把这些讲学内容当作考试的方向，以至于我们很难厘清这些诸生究竟是因向慕阳明学，或是因李日宣的官员身份而与会。如会讲中便有人问：

① 徐即登：《来益堂稿》卷五《许敬菴先生时义序》，第35页。

② 徐即登：《来益堂稿》卷五《许敬菴先生时义序》，第35—36页。

③ 李邦华在明末更曾接续邹元标的讲学活动，但李邦华多数时间在朝任官，加上理学非其所长，所以影响不大。关于李邦华的学术，请见吴振汉《明儒李邦华的治世与殉国》，《全球化下明史研究之新视野论文集》，东吴大学历史学系，2007年，第1—16页。

一生问先生：所讲者，举业乎？抑圣贤学问乎？^①

显示李日宣所讲的心学，被一些人当作是有助于制艺写作的举业学问。

阳明学大儒刘元卿叔侄的例子也很有代表性，可用来具体说明阳明学与举业之间的关系。刘元卿，字调甫，号泸潇，安福县人，他因在经学上无师承，加上初期应试不利，一度重病并灰心丧气，此后在青原讲会识邹德涵、邹德溥兄弟。邹氏家族从邹守益以来便以《春秋》学著称，加上邹守益是会元，所以不少人认为邹氏兄弟也继承了邹守益在制艺上的会元衣钵。^②也因此，邹氏兄弟在阳明学与制艺写作上，都颇为人所重。邹德涵与刘元卿谈论学问，所谈的应同时包括心学与举业，此后刘元卿在乡试中便选择《春秋》为其经学科目。刘元卿之侄刘孔当亦在邹德溥门下学习举业及《春秋》学，邹德溥有《刻真传安福诸名家麟经秘旨梅林臆见》一书传世，此书是科举用书，便由刘孔当参校，而当时不少人还因刘孔当亲承邹德溥口授《春秋》学旨而执贽其门下。此后刘元卿、刘孔当叔侄二人不仅分别考取举人与进士功名，并且在安福西乡兴建书院，倡导阳明学。^③

连作为安福讲学中心的复古书院，也无法脱离制艺写作的影响。万历中期邹德泳重振复古书院的讲学活动，虽未能再现过去千百人听讲的盛况，但仍吸引一些当地人士的参与。有意思的是，邹德泳除了讲学以外，也有四书文留下，而且从批点内容可知，这些四书文曾在阳明学社群中传阅，甚至有可能曾在讲会中讨论。如邹德泳作《若有一个臣至尚亦有利哉》，文末有赵彦良评，赵彦良有可能是地方上参与讲会的小读书人，他评：

① 李日宣：《敬修堂文集》卷一七《会语》，中山大学图书馆藏，第11页。

② 张艺曦：《汤宾尹与晚明制艺八股文的流行及传说》，（台北）《汉学研究》2002年第1期。

③ 据刘元卿表示，邹德溥是刘孔当的经师，故知刘孔当在邹氏门下学习《春秋》，而邹德溥也说刘孔当在其门下学习举业作文，并因此以文名当世。见刘元卿《喜闻太史行状》卷八，《刘聘君全集》，《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54册，第31页；邹德溥《翰林院编修喜闻刘君墓志铭》，《南溪刘氏续修族谱》，上海图书馆藏清崇本堂木活字本，第10页；刘孔当《邹先生麟经传心录叙》卷二，《刘喜闻先生集》，据日本内阁文库藏明万历三十九年（1611）刊本影印，第52—54页；《刻春秋跃渊会草叙》，同前书，卷一，第33页。此后刘孔当在万历二十年（1592）邹德溥任主考官时考取进士功名。

会题之窾，故出之纚纚洋洋，满而不竭，此尤老于学而深于工者，可以式靡，可以矩俗。

邹德泳则自批：

此题作者不曰摹，则曰绘，甚有著谱字者。至于一个臣，则任真作一个臣，一用再用三四用，若有二字，则又曰：想之忆之拟议之，只将此数字束缚成篇，自以为时局中高手，而不自知其说梦也。题中大意，全然不知发挥。余特拈此与诸相知商之，庶作一醒魔汤云。^①

根据邹德泳的批点内容推测，原本有人就某题目拟作，而被邹德泳评为“不自知其说梦”，所以邹德泳重作一文以示人，“庶作一醒魔汤”。另一篇四书文《从容中道圣人也》，则是作于邹德泳 72 岁时，^②此文文末有朱世守手批语。朱世守是邹守益弟子朱叔相之孙，万历二十三年（1595）进士，从学王时槐门下，他的批语——

此题最难，恰肖天然，逼真圣谕，深言浅言，用虚用实，惟我儒宗，信手拈来，落笔便韵。……（此文）当与前小试拟作一首合刻，以式多士，亦艺林一快也。^③

儒宗指邹德泳，而朱世守建议应合刻两首拟作的四书文，作为士人作文的范本。另一篇《远之则有望。在彼无斁》，朱世守则手批——

一气喝成，惊霆闪电，经生望而卻走，其名理名言，牛毛茧丝，通昼夜而知，剖天人之秘，居然理学宗师，敢不下拜！^④

① 邹德泳：《圣门律令》，《邹德泳杂著》，第 4—5 页。

② 邹德泳的年纪应小于邹德涵与邹德溥，邹德溥生于 1549 年，所以据此往后加 72 年即 1621 年，即天启元年，亦即此文可能作于天启元年以后。

③ 邹德泳：《圣门律令》，《邹德泳杂著》，第 7—8 页。

④ 邹德泳：《圣门律令》，《邹德泳杂著》，第 16 页。

把一篇四书文当作剖析天人之秘，把作文者当作理学宗师。这段话若不是放在四书文之末，看来便像是讲学语气。从赵、邹、朱等人的批点可知，当地应该有一群人相互点评或讨论四书文，而且很可能都是当地的阳明学社群中人。

另外也常见一些小读书人同时往来讲会与制艺文社之间。如永新李其昌，据载：

李其昌，字君求，为文淡折古雅，曾公尧臣选吉州合社，刻其稿，寻讲学依仁书院。其昌讲万物皆备章，语契旨，文江李忠文公（按：李邦华）深器之。生平孝友，族人以为矜式。^①

李邦华是邹元标的弟子，从邹元标到李邦华，先后主持吉水县城的仁文书院及庐陵县的依仁书院讲学。李其昌既在作为制艺文社的吉州社中，也参与依仁书院的会讲。

循此脉络来看万历年间江西的制艺名家名单，共有五人，分别是邓以赞、汤显祖（1550—1616）、邹德溥、李光元（1575—1625）与舒曰敬，^②其中心学家便占了两名，而且分别是南昌与吉安阳明学的代表人物。这并非偶然，实则是因阳明学与制艺写作有很深的交集。

从心学家谈制艺写作，以及阳明学进入科举用书影响儒经的注解，显示万历朝以后，阳明学讲会虽呈现中衰之势，但阳明学却借明末的制艺风潮及文社，而扩大其影响力，进入讲章及儒经注解中，并且被许许多多准备科考的小读书人所摩挲研读。当明中期阳明学极盛时，尽管吸引不少人参与讲会，但毕竟仍有一些人是对阳明学兴趣阙如，或敬而远之的。如今借由制艺及科举考试，让阳明学被更多人所熟悉。

最后，文德翼的这段话应可说明江西派如何看待心学（或广义的理

^① 萧玉春修，李焯纂：同治《永新县志》卷一七《人物志·文苑》，同治十三年刊本，第11页。

^② “隆万间江右以制艺传者，新建邓文洁以赞，临川汤若士显祖，安福邹泗山德溥，进贤李魏庵光元，共先生（按：舒曰敬）而五”，见陈弘绪《江域名迹》卷二《只立轩》，文渊阁《四库全书》，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588册，第39页。

学)与制艺的关系,他说:

本朝休养于□祖宗之教化百年,至成、弘而文章始盛,是时士大夫重危行。又百年至嘉、隆而道学始盛,是时士大夫重清议。今将又百年矣,道学辍讲,文章无师,清议不闻于耳,危行不接于目,学官弟子因之益偷矣。呜呼,迁都江左,岂运气运之咎欤?^①

此处的文章即制艺。文德翼并提制艺与理学,以二者作为士人所应习,也因此成为国家气运之所系。这段话让人正好想起涂伯昌:他用心研习心学家的著作,将所悟用到制艺写作中,以制艺作为心学的成果及结晶。

结 语

当我们讨论阳明学,必须区别学说与讲会,两者虽密不可分,但又有别。尽管阳明学的学说对明代中晚期的影响极大,但阳明学讲会在万历后期以后却有转衰的迹象,即使在吉安这个心学重镇,较诸明中期动辄数十百人的盛况,讲会在数量及规模都明显萎缩。另一方面,阳明学说虽借讲会而流传,随着讲会的式微,阳明学学说并未随之而衰,反而更渗透到科举用书中,影响士人的制艺写作。钱谦益(1582—1664)说:“自江门、姚江之学侧出于经术,……于是乎封蔀之以制科之帖括。”^②此处帖括是负面用词,但仍指出了明末阳明学从一家之言,而进入科举用书及制艺写作的现象。

从阳明学讲会转向制艺文社,来到明末已几乎是难以逆转的趋势。阳明学大儒与小读书人间形成很大的对比,大儒继续讲述心学学说,但小读书人所在乎的是这些学说,跟制艺写作间的关系。涂伯昌正是很好的例子,他努力学习心学,研习大儒文集或语录,期待能有所悟,以便有助于

^① 文德翼:《求是堂文集》卷四《梅溪制义序》,第17页。

^② 钱谦益:《牧斋有学集》,卷二〇《从游集序》,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850—851页。

他的制艺写作。邹德泳与小读书人讨论制艺，或可视为阳明学的最后一幕。邹德泳只有转步，而尚未移身，在他之后，则是更进一步形成以制艺为主，而阳明学被制艺所用。于是在此制艺风潮下，而有大大小小的各个制艺文社的成立。阳明学从明中期独立发展，到明末与制艺交集如何影响及带动明末制艺风潮及文社的发展，则是可更深入讨论的课题。

（作者单位：阳明交通大学人文社会学系）